

# 史學家之謎：賈梅士在澳門

洛瑞羅\*

一個多世紀以來，有關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又譯：路易斯·德·卡蒙斯）在南中國海遭遇海難及其在澳門居住過的故事一直存在着種種爭論，所耗墨水足以匯成一道溪流。儘管有些意見並沒有多大意思，也沒有多少值得參考的地方，然而可以斷言的是，類似的爭論還將繼續下去，而且新的爭論同樣不會給這個始終充滿歧見的領域帶來突破，其原因在於直到今天仍然沒有發現任何新的足以令人感到需要重新認識這個問題的文獻。正因為如此，本文也不想有甚麼不切實際的太大的奢望，祇想對現有的一些歷史傳說加以適當的概括和梳理，從中探尋一下賈梅士這位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在個人及文學方面同天朝（Celeste Império）<sup>(1)</sup>的聯繫。

1572年首次問世於里斯本的《葡國魂》（*Os Lusíadas*）（又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或《路西亞達》等）是葡萄牙文學寶庫中最偉大的作品。然而它不是從一開始就企望是一部單純講述地理、歷史或時事的著作，儘管其中包含着豐富的地理知識<sup>(2)</sup>，儘管它與葡國歷史、同他創作這一作品之前的幾十年內發生的一些大事有着複雜的關係。<sup>(3)</sup>其作者賈梅士在這部史詩第十章中敘述了亞洲的地理情況，其中特別提到中國。實際上，這部偉大作品早在里斯本問世前半個多世紀，葡萄牙就開始通過其商人、傳教士及冒險家在其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在亞洲同當地人艱難地打交道的過程中得到有關中國這樣或那樣的訊息，因此早在那個時候就對中國這個亞洲大國有了相當的瞭解。

賈梅士在其作品中好幾處地方提到中國，但主要則是在第10章中寫道：

還有那世人不諳的南海灣，  
就在這裡屹立着中華帝國，  
她有難以想象的土財富，  
從北回歸線到寒冷的北極，  
全部歸屬她那遼闊的幅員。<sup>(4)</sup>

在這裡，詩人激情贊美中國，說這個東方帝國有漫長的海岸線，有橫跨幾個氣候帶的遼闊國土，有多得難以估量的財富，還特別強調其公開推行的與世隔絕的政策。對於這個當時被世人稱為“天朝”的國家，賈梅士在其史詩的其它章節還曾三次提及<sup>(5)</sup>，儘管都是三言兩語，但對《葡國魂》這部作品情有獨鍾的讀者在讀到這些詩句時，同樣可以得到許多關於亞洲東方這個最大國家的基本知識。這些知識，賈梅士或許在印度的長時間逗留期間，根本不需要

透過甚麼特殊的通訊手段，祇從當時就熟悉中國情況的



\* 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客座教授，東南亞問題葡萄牙語研究中心（里斯本）研究員。



葡萄牙人的口中就可以十分容易地獲得。總而言之，詩人在其作品中向我們傳遞的有關中國信息，絕不意味着他一定遊歷過這個國家的沿海地區。

賈梅士的東方傳奇經歷，及其幾乎所有同時代的不如他知名的葡萄牙人的傳奇經歷，現今人們知之甚少，因為流傳至今的相關文獻實在太少。儘管這位詩人後來出名了，但他在世時並未引起當時文學界作家們的任何注意，因為他們通常祇追蹤和記錄那些有影響的大人物的生涯。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很有把握地說，賈梅士當時一定在亞洲的一些葡萄牙人定居點居住過，比如說在 1553-1569 年間曾在果阿居住。當時他在那裡過着幾乎居無定所的軍人生活，這種生活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那種條件下的葡萄牙人來說非常典型，簡直可以說就是家常便飯。在印度，每年 6-9 月是雨季，這個時期過着相對貧困生活的葡萄牙人幾乎無所事事。然而在隨之而來的時間裡，他們就要進行緊張的軍事格鬥和不停的海上航行。在那段期間，他們可以游弋到東方浩瀚海洋中任何設有葡萄牙人定居點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葡萄牙人擁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sup>(6)</sup>

詩人謝世後有幸在文學界出名，迫使歷史學家們不得不通過對其內容豐富的作品，包括他寫的兩封信件及其大量富於想象的創作，試用詮釋的方法去彌補作者傳奇經歷中的許多空白。直到今天，仍有許多史學家還在不斷虛構詩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杜撰和虛構常常是基於對賈梅士史詩及其抒情詩中某些不甚透明的段落的隨意解釋而已。<sup>(7)</sup> 然而，如前所述，賈梅士的“人文及情感生涯至今仍充滿着陰影，僅憑藉其詩歌是不足以完全弄清楚的”<sup>(8)</sup>。

賈梅士的傳奇經歷中，傳說有三點是與中國有關的，但實際上所有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因為都沒有得到任何可靠文獻的證實。這三點之中，首先一點是，說他在一次去中國的旅途中，在某個無法確定時刻被葡萄牙國王委任為低級行政官員以回報他的貢獻；其次是說他在一次去中國的航行中或從中國回程的航行中，在南中國海遭遇海難；第三點則說他於 16 世紀中葉在葡萄牙人頻繁出入的中國沿海某個口岸（或許就是馬交）停留過一段不長不短的時

間，並在那裡潛心撰寫他的《葡國魂》。當然，由這三點還衍生出種種充滿細節描寫的故事來。如說他擔任的行政職務可能是死者事務專員或死者事務總監，如說他遭遇的海難可能發生在東埔寨沿海湄公河口，或發生在科欽支那（Cochinchina）海域被稱為“帕爾塞爾淺灘”那一帶，我們的詩人或許正是從這裡倖免於難並奇跡般地從洶湧的波濤中奪回了他之前通過如此堅韌不拔的勞動才寫成的史詩手稿；又如說他在那次海難中失去了同他一道旅行的一位中國姑娘，那位姑娘或許祇不過是他的女僕，或許是他的情侶；再如說他在中國沿海遊歷期間，就住在剛剛建立的定居點——馬交，他的《葡國魂》有一部分就是在其地寫成的，云云。

然而，我們發現賈梅士與中國相關的傳奇經歷中包含着一些虛構的成分，包含着一些最富於浪漫主義想象的戲劇性因素，請問至今有甚麼文獻能夠證實這一切並不確實的事件呢？

賈梅士在中國南海遭遇海難的假說主要基於他的《葡國魂》第 10 章中的一段詩句，其中在談到湄公河時這樣寫道：

這條靜謐而安祥的大河呵，  
將把浸濕的詩章迎入懷抱，  
詩人遭受不幸的悲慘海難，  
僥倖從淺灘的浪濤中逃命，  
忍饑挨餓度過巨大的危險。<sup>(9)</sup>

如果說那些所謂“被浸濕的詩篇”指的確實就是《葡國魂》的手稿，那麼有些學者對其餘詩句的詮釋就更成問題了。正因為如此，它一直引起激烈的爭論。仔細閱讀這幾行詩句，我似乎覺得清楚的是，倘在其中有任何提及一場“令人遭受不幸的悲慘海難”，那麼這一災難很可能是發生在位於南中國海某個難以確認之地方的“波濤洶湧的淺灘”所在地。當時印度支那那條“靜謐而安祥”的大河把那個遇難者，或者更確切地說，把那些遇難者迎入“自己的懷抱中”，好在他或他們死裡逃生，“忍饑挨餓度過巨大的危險”。這也就是說，賈梅士可能是在中國

◀ 賈梅士在澳門巖洞中（石版畫） 弗蘭西斯科·梅特拉斯（Francisco Metrass）根據原畫摹繪（1866年）

海岸與暹羅灣之間某個地方遭遇海難，之後隨身攜帶那些“被浸濕的詩篇”即《葡國魂》手稿或其部分手稿，在湄公河三角洲某個安全港口上了岸。

有關賈梅士遭遇海難的事最早出現在1572年問世的《葡國魂》版本中，這一事件很快在其後的16-17世紀出版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並引起爭論。賈梅士於1580年逝世。其後沒幾年，即在1584年問世的新版《葡國魂》第7章第80節的旁邊有這樣一條評註：“賈梅士在印度逗留期間，開始走好運，因而為自己添置了些衣物，可惜在去中國的旅途中都丟清光了。”緊接着，這個沒有署名的註釋還補充道，針對這次災難之後詩人寫成了“那首抒發自己感慨的詩歌”。<sup>(10)</sup>關於賈梅士遭遇的海難，根據現今人們知道的最早的出版物，很可能是發生在一次去中國的旅途中，發生在遠東浩瀚大海中的某個無法確認的地方，但不一定就是發生在湄公河河口附近，也不一定就是發生在柬埔寨沿海地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這次海難是發生在去中國的旅途中，那麼它很可能打破了詩人實現這一旅程的夢想，至少在當年必定如此。從馬六甲去中國海岸的航行時間十分苛刻，因為它要受到季風的限制。從馬六甲啟程通常是在每年四、五月份，到達中國沿海的航程時間大約為一個月。如果啟程晚了，遇險失敗的可能性勢必增大，甚至有可能發生海難。因此，我們甚至可以設想，賈梅士之所以在去中國的航程中遭遇災難，是否因為他們不是在通常應該啟航的時間從馬六甲啟程的緣故。對於這一問題，下文還將作進一步的探討。

若干年之後，即在1613年，《葡國魂》又一新版本問世。在這一版本中，馬努埃爾·科雷亞<sup>(11)</sup>對第10章第128節作了一個評註：“這表明詩人是如何從中國來到卡姆巴亞（Cambaya）王國的<sup>(12)</sup>；在那裡他休息了一些日子，以消除從中國出發的這一旅程所帶來的極端辛勞，以消除在那個國家充滿險惡淺灘的海域中遭遇從一次又一次海難中逃命所造成的驚恐心情。接着他前往印度，然而當他一抵達那裡便被抓了起來，拘捕令是總督弗蘭西斯科·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下達的，被捕原因涉及他

履行職責隨身攜帶的死者財產問題，因為他早在去中國的途中就被委任為死者事務總監。”<sup>(13)</sup>這一評註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因為其中提及詩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海難中從險惡的海灘中“逃生”，還說他在柬埔寨王國的某個地方經過休息消除旅途勞累，從而精神逐步恢復云云，這與前述他祇遭遇一次海難顯然不可同日語。現在看來，他們在從中國返回馬六甲的旅途中很可能是在湄公河沿岸的某個地方作短暫停留。問題還不止於此，評註中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從中國返回的旅途中”擔任死者事務總監的詩人賈梅士可能在處理委托他保管死者財產的問題上有不合法行為，因此當他一回到印度就被總督弗蘭西斯科·巴雷托下令逮捕了。這位印度總督的任期是從1555年到1558年。<sup>(14)</sup>與此同時，在稍早於上述1613年問世的《葡國魂》所出版的一本題為《賈梅士傳奇的一生》的簡短傳記中，佩德羅·德·馬里茲（Pedro de Mariz）以詩人第一位傳記作者的權威身份指出，賈梅士是在中國逗留期間被印度“總督”委任為“死者事務總監”的（請注意，這一說法同前述並不一致！）。作者進一步指出：“然而，他並沒有因擔任此職務而賺得大量錢財，儘管本來是可以賺得更多的，所以他的日常開銷並不寬裕。更有甚者，所餘財產在後來的一次令其感到恐怖的海難中全部丟失，對此他在其史詩的第10章第128節有所提及。”<sup>(15)</sup>至此，關於海難的事現在看來已經基本弄清了，儘管這次意外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仍然是個謎。此外，關於賈梅士究竟擔任過甚麼職務在這裡似乎也得到了確認，即“死者事務總監”。

馬里茲對馬努埃爾·科雷亞詮釋的質疑是顯而易見的。他在提及《葡國魂》作者生平中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時期時，無疑對賈梅士傳奇經歷中的“中國問題”的澄清作出了巨大貢獻。他肯定了賈梅士有關中國的傳奇經歷中的兩個主要點，即在中國海域的某個地方遭遇海難，以及在中國逗留期間被委任為死者事務總監，儘管這一點至今仍有爭議。佩德羅·德·馬里茲當時是王室檔案館書記官，他從1605年開始擔任此職務，直到1615年去世為止。<sup>(16)</sup>由於職

務關係，說不定他真的熟悉那些能夠證明其以上斷言的文獻。不過即使如此，這樣的文獻至今也還沒有被誰發現。

賈梅士在東方的經歷當時幾乎無人知曉，也無任何同時代文獻有所記載。對於這點，或許是由於他當時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所致，因為他實際上祇是個小貴族大不了算是中層貴族<sup>(17)</sup>，而且也祇當過小官而已。他在印度停留的時間比較長，但在那些年代的原始文獻中仍然找不到有關他的絲毫記載。在這裡或許值得順便指出的是，他當時曾為他的一個名叫加西亞·德·奧爾塔（Garcia de Orta）的醫生於1563年在果阿出版的一部叫做《印度藥用植物及藥物對話》寫過一篇序，他於其中盛贊雷東多伯爵的功績。<sup>(18)</sup>然而，倘說賈梅士在亞洲期間遊歷過遠東（請注意，這一特殊地理概念當時主要是指馬六甲以東，包括中國和日本以及馬魯古群島在內的廣大地區）的某些地方這一點大體上還能得到公認的話，那麼要確切地指出他究竟遊歷過甚麼特定地區，特別是是否到過中國，或更具體地說是否到過澳門，那就誰也不能說清楚了。

然而有關賈梅士到過中國，以及他在中國的海域遭遇海難的故事早就迅速傳播開了，儘管從未有任何原始文獻資料對此加以確認。1624年，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Manuel Severim de Faria）在其所著《賈梅士的一生》中說，總督弗蘭西斯科·巴雷托“下令拘捕了他，並於次年即1556年將他放逐到了中國”<sup>(19)</sup>。這裡首次指出賈梅士啟程去遠東的具體時間，儘管其中提供的信息資料與上述其它相關的資料有矛盾的地方，譬如這兒說他被監禁是在出發去遠東之前，而不是在到達果阿之後。但有一點看來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正如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弗蘭西斯科·巴雷托擔任印度總督的時間是在1555-1558年間，而且還應指出，由於中國是位於東方的離葡萄牙勢力範圍最偏遠的地區之一，顯然當時不是理想的放逐地，因為被放逐者可能從那裡逃走。

不過，在賈梅士時代，對於葡萄牙人來說，中國確實是一個遙遠的地方，正因為如此當時許多與



賈梅士肖像

費爾南·高美士（Fernão Gomes）作 1570年

印度國當局有意見分歧的葡萄牙人都漂泊到那裡，以避免印度當局可能找他們的麻煩。<sup>(20)</sup>此外，許多夢想迅速致富的冒險家由於聽說中國十分富庶發達，於是也都紛紛趕到那裡。所以，我們認為，上述所謂賈梅士被“放逐”到那裡，最大可能是塞維林·德·法里亞把他作為每年從印度斯坦西海岸的港口駛向遠東海域的許多艘軍艦上的無數軍人之一加以描寫的一種富有詩意的想象形式。如果是這種情況，賈梅士可能參加了比如說如塞維林·德·法里亞也提到過的“馬六甲之旅”<sup>(21)</sup>或者所謂“中國之旅”，因為這是16世紀中葉之後從果阿到東亞的兩次主要海上之旅。<sup>(22)</sup>此外，塞維林·德·法里亞在其賈梅士傳記中還提到佩德羅·德·馬里茲以前的一些說法。譬如說，在描寫賈梅士中國之旅時，他寫道，詩人在柬埔寨沿岸航行時於湄公河河口附近發生意外，“他們的航船在那裡撞上了暗礁，被撞得粉碎，於是大家都遭遇悲慘的海難，賈梅士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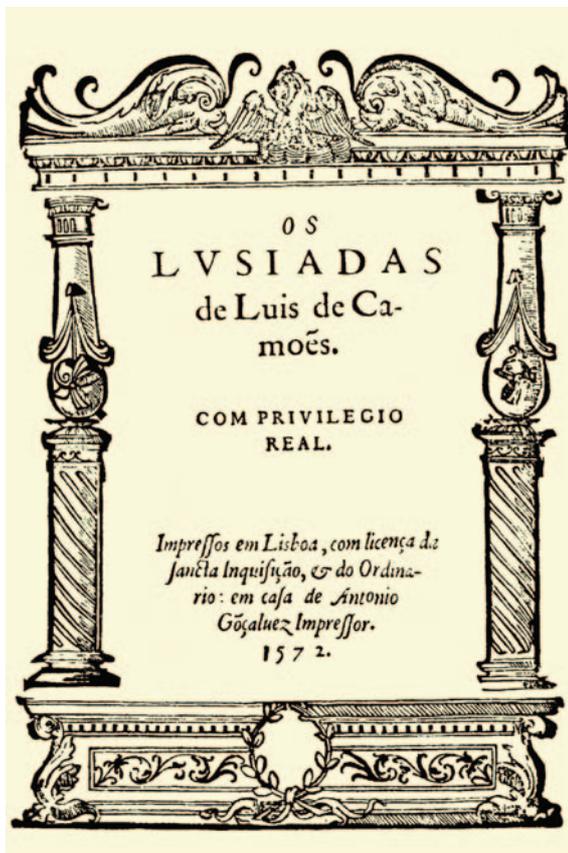
抓住了一塊木板泅泳而倖免於難”<sup>(23)</sup>。這裡第一次提到賈梅士所遭遇的海難發生在柬埔寨沿海的湄公河這條亞洲大河的河口。而且，我們也第一次看到詩人一手抱緊他的史詩手稿，一手抓住一塊木板泅泳，從而得以從一次恐怖的海難中逃生的經典形象描寫。<sup>(24)</sup>

不多年之後，賈梅士作品的另一位評論家，學者馬努埃爾·德·法里亞·依·索沙（Manuel de Faria e Sousa）<sup>(25)</sup> 在他於 1639 年出版的《葡國魂》評註本中再次指出，“我們的詩人從中國回來，之前他是以死者事務總監的身份去那裡的，在回程中他乘坐的船隻不幸沉沒，好在他最後得以像塞薩爾那樣，隨身攜帶着自己心愛的作品從海難中逃生”。<sup>(26)</sup> 這樣一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賈梅士遭遇海難的時間無形中被推後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評註者混淆了馬努埃爾，科雷亞及佩德羅·德·馬里茲兩人所作的評論，加上那時關於那次意外不斷有新的說法，在那種情況下出現隨意推測的現象當然就不可避免。其實任何一位講故事的人都可能如此這般，所以近代有個詮釋家在他的著作中這樣斷言：“我相信，從此時此刻起，賈梅士的‘被浸濕的詩篇’就會被他的詮釋家們解釋為從水中搶救回來的詩篇。”<sup>(27)</sup>

然而，本文撰寫的目的完全不是試圖勾劃有關賈梅士傳說的來龍去脈或為《葡國魂》的讀者編造新的故事，而是為了從歷史的角度出發盡可能確定一下詩人賈梅士涉足中國的傳奇經歷到底有多少程度的真實性。<sup>(28)</sup>

## 海難

如上所述，所有對賈梅士遭遇海難一事的探索研究都起因於《葡國魂》第 10 章第 127-128 節，其餘的一切都是賈梅士的一些評論家或研究者在這位詩人謝世後進行的沒有任何文獻根據而作的大膽虛構和推測。當然，在《葡國魂》第 10 章的那兩節中，詩人可能對發生在中國海域的“波濤洶湧的淺灘”中的悲慘海難埋下了某些模稜兩可的種籽，但完全是因為詩人



1572 年里斯本首版《葡國魂》封面

後來出了名才令他的傳記作者們在這一有爭議的情節上動如此之大的腦筋去推斷和構思。

如果我們考慮到 16 世紀中葉南中國海的航行條件，那麼我們就會感到賈梅士在那裡遭遇意外的歷史真實性是可以接受的。眾所周知，當時航行在馬六甲及中國之間的航道上葡萄牙的往返船隻曾經發生過無數次海難。任何一艘船祇要從馬六甲啟程晚了，祇要不是在適合航行的季風期從那裡出發，在旅途中就十有八九會失事。比如說，弗蘭西斯科·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神甫，他在 1549 年 1 月出發去日本的前夕，曾就他們不得不經過馬六甲與中國沿海之間的航線問題，在科欽（Cochim）這樣寫道，這將是一次“充滿巨大生命危險的，充滿暴風驟雨及暗礁險灘的旅行，假如我們去的四艘船中有兩條能最終安然無恙，那就是萬幸了”<sup>(29)</sup>。

但是，從歷史真實性的觀點來看，如果賈梅士

在旅途中遭難不留下任何問題，如果不是連他本人也不能說清楚其意外發生的地點，也就不至於直到今天人們都還不能弄清這個問題。早有學者認為賈梅士乘坐的船隻可能是萊昂內爾·德·索薩（Leonel de Sousa）的，因為根據萊昂內爾的記載，他的船是1558年底或翌年初在結束了一次富有成果的“日本之旅”後返回馬六甲途中的，是在經過“中國的一個海灣的淺灘時”失事的。<sup>(30)</sup>根據已有的文獻資料，這位船長出事的地點已經可以確定，即是在一個名叫“伊列斯群島”（Ilhéus）或“帕爾塞斯淺灘”（Baixos dos Parcéis）發生的，該名稱早在15-16世紀的葡萄牙航海文獻資料中就已記載，同時也被當時的駕駛員、導航員以及其他海員廣泛地用來稱呼那一大片綿延於中國南部沿海的從北向南走向的礁石和淺灘。<sup>(31)</sup>

本世紀初，一位專門從事海外問題研究的多產學者在不自覺或至少沒有引用加斯帕爾·莫雷拉（Gaspar Moreira）的《航海日誌》中關於確認萊昂內爾·德·索薩遭遇海難的準確地點的相關記載<sup>(32)</sup>的情況下，祇根據當時他手邊僅有的文獻資料證據加以巧妙的推斷，正確地將其意外發生地點定在“帕爾塞斯群島”（Ilhéus dos Parcéis）。對此，他這樣寫道，我手邊的文獻資料“讓我相信，那次海難可能發生在東京灣東南海域的一道穿過安南國北部的緯線上，或者更準確地說發生於在古代地圖上被稱為‘帕爾塞斯群島’或‘帕爾塞斯淺灘’的一處淺灘上”<sup>(33)</sup>。至此，似乎一切都清楚了。然而緊接着正是這同一位史學家卻顯得有些武斷地說，賈梅士的“procelosos baixos”（波濤洶湧的淺灘）<sup>(34)</sup>之詩句包含着一個錯誤，說實際上應當是“prancelosos baixos”（佈滿暗礁的淺灘），因為這一詞語能準確無誤地傳遞在那淺灘中潛藏着“prancel”或“parcel”（暗礁）的可怕信息。<sup>(35)</sup>這樣一來，那詩人賈梅士遭受“不幸的悲慘的海難”便可能完全同萊昂內爾·德·索薩所認為的海難相一致了。是的，既然海難發生時間及地點都一致，那麼那應該是最充足的證據了。但是，迄今尚沒有任何可靠的文獻資料能證明《葡國魂》的作者可能乘坐的就是那位著名的阿

爾加維船長的航船。這純粹是一種推測，何況這一推測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批駁。<sup>(36)</sup>

有幾部賈梅士時代寫成的詩集僅以手稿形式流傳下來，先後得以出版發行，這為人們弄清賈梅士遭受海難意外提供了新的途徑。<sup>(37)</sup>譬如在1578年寫成的《克里斯托旺·博爾熱斯抒情詩集》中就收集了賈梅士關於“流淌的江河”的部分五音步或七音步詩，其前頭貫以題目“賈梅士，他在中國遭難”。這本詩集編成時，賈梅士還在世。強調這一點有特別的重要意義，因為這是涉及我們在此議論這個問題的具有文獻價值的原始資料。但請注意，詩中所說的“遭難”並不必然等同於上述的“遭遇海難”。<sup>(38)</sup>不過，同樣是這些五音步或七音步詩，當它們或許在稍晚些時候出現在馬德里的《皇家歷史學院抒情詩集》中時，卻附有一個說明，其中提到詩人賈梅士在去中國的旅途中遭遇了一次“嚴重的海難”。<sup>(39)</sup>值得強調的是，還在賈梅士在世時就收集成冊的這些詩歌手稿原件有助於增加有關賈梅士遭遇海難這一觀點的可信度。

至於這些“流淌的江河”的五七音步抒情詩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寫成的，我們並沒有興趣在這裡下結論，儘管有必要指出，新近有些學者認為它們是賈梅士晚年時期在里斯本寫成的。<sup>(40)</sup>我們的真正興趣在於希望進一步探討詩人到底是在甚麼地方遭遇海難。如果他真的是捲入了發生在中國海域某個地方的那次海難的話，看來他最有可能是在從馬六甲到中國的一次旅途中，而且是在到達目的地之前遇難的，從災難中逃生後，正如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抒情詩集》中所推測的，他們隨即在柬埔寨沿海靠岸。我們認為，從《葡國魂》中所能找到的有關科欽支那、中國及日本的不多的信息資料中至少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不過，正如昔日一個專門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所指出的，從書中傳遞的那些信息來看，詩人實際上對那些地區相當陌生。<sup>(41)</sup>

湄公河三角洲當時並不是航海家們特別害怕的地區，儘管加斯帕爾·莫雷拉（Gaspar Moreira）的一本《航海日誌》中曾警告說，在其附近的“漲潮和退潮非常洶湧澎湃”。<sup>(42)</sup>但葡萄牙船隻從馬六甲到

中國通常所走的航道並不靠近湄公河。他們到中國海岸的航船一般在每年四、五月份從葡萄牙人的定居點馬六甲出發，然後在馬來亞半島東岸的帕坦（Patane）停靠，在那裡他們至少從1533年起通常要購買大量的胡椒運到中國口岸去轉售。接着，他們穿過暹羅灣向北走，沿着柬埔寨與占婆王國（Champá）交界的海域，逕直駛向位於印度支那半島附近的普洛孔多爾島（Pulo Condor）。之後，葡萄牙船隻沿着海岸線繼續向北駛去，繞過科欽支那抵達位於東京灣南大門的普洛卡唐島（Pulo Catão）。最後，直接駛向中國廣東省沿海島嶼，經過大約一個月的航行，通過幅員遼闊的海南島南部海域抵達那裡。（43）

即使航行嚴格地按照季風所強加的苛刻的時間表進行，在某些航道上，由於那裡有淺灘，並經常遭暴風驟雨襲擊，所以仍難以避免險情的出現。



總督弗蘭西斯科·巴雷托

馬努埃爾·德·法里亞·依·索薩的著作《葡萄牙的亞洲》插圖

1548年，弗蘭西斯科·沙勿略神甫在描寫從馬六甲到日本的航行時，曾經特別指出，那是“充滿巨大生命危險的航行，是頻繁遭受暴風驟雨襲擊的航行，因而時常發生海難，而且在這一航行中，尤其是在到達中國海域後，航船還常常遭到活躍在那一帶的中國海盜的搶劫”（44）。因此，祇要我們能證實賈梅士的確參加了赴中國之旅，那麼他遭遇海難看來就肯定是真實的。然而，如果賈梅士確實在這一航程中遭遇海難，那麼這一意外發生在湄公河三角洲就幾乎沒有可能。科欽支那海岸或許是最有可能發生意外的地方，假如是這種情況，那麼受難者們很可能駕船駛向湄公河三角洲，以便從位於那裡的口岸出發，在最有利的時機返回馬六甲。

還有另一個證據令賈梅士他們遭遇海難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了。這是由一個有文獻資料證實是非常卓越的歷史學家、作為若奧·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sup>(45)</sup> 著作的繼承人、《亞洲幾十年》的著名作者迪奧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在其約於1614年或1615年寫成的長詩《80年代》中所提及的事件而引起的。他在該作品中說，1569-1570年間，當賈梅士來莫桑比克王國旅行時，他們曾在那裡相聚過。這位知名編年史家大約從1559就長期生活在東方，直至1616年在果阿逝世。

詩人賈梅士是科托的好朋友好伙伴，當他停留在東非的那個城堡王國中等候回葡萄牙的航船時，完全靠朋友資助及他人救濟度日。科托在其著述中解釋了賈梅士當時的生活為何如此艱難的原因，“他當時一貧如洗，因為他在之前去中國的旅途中，被弗蘭西斯科·巴雷托總督委任為死者事務總監，然而在從那裡返回的途中，卻在暹羅灣與同船的伙伴們一同遭難，儘管許多人看來都得以逃生，但一個個隨身攜帶的財物都丟清光，賈梅士雖然也倖免於難，但除了他隨身攜帶的《葡國魂》手稿外，別無所有，就連同他一道上船並始終緊隨身邊的一位十分漂亮的中國姑娘也在這次意外中痛失了。因此他懷着沉重的心情寫了一首十四行詩來悼念那位中國姑娘的逝世。他在詩中這樣寫道：

我的心靈呀，你快快不樂地  
 這麼早就離開人世，  
 永遠地在天堂安息，  
 卻留下我在世間孤雁哀鳴……

詩人在其作品中稱呼這位姑娘為迪娜梅妮 (Dinamene)。有關這段辛酸經歷，他在另一首充滿哀愁的詩歌中也有充份的流露。他這樣寫道：

沿着巴比倫流淌的江河啊，  
 我坐在你的身旁哭泣，  
 不禁想起了那暹羅灣，  
 想起了在那裡遭遇的一切！<sup>(4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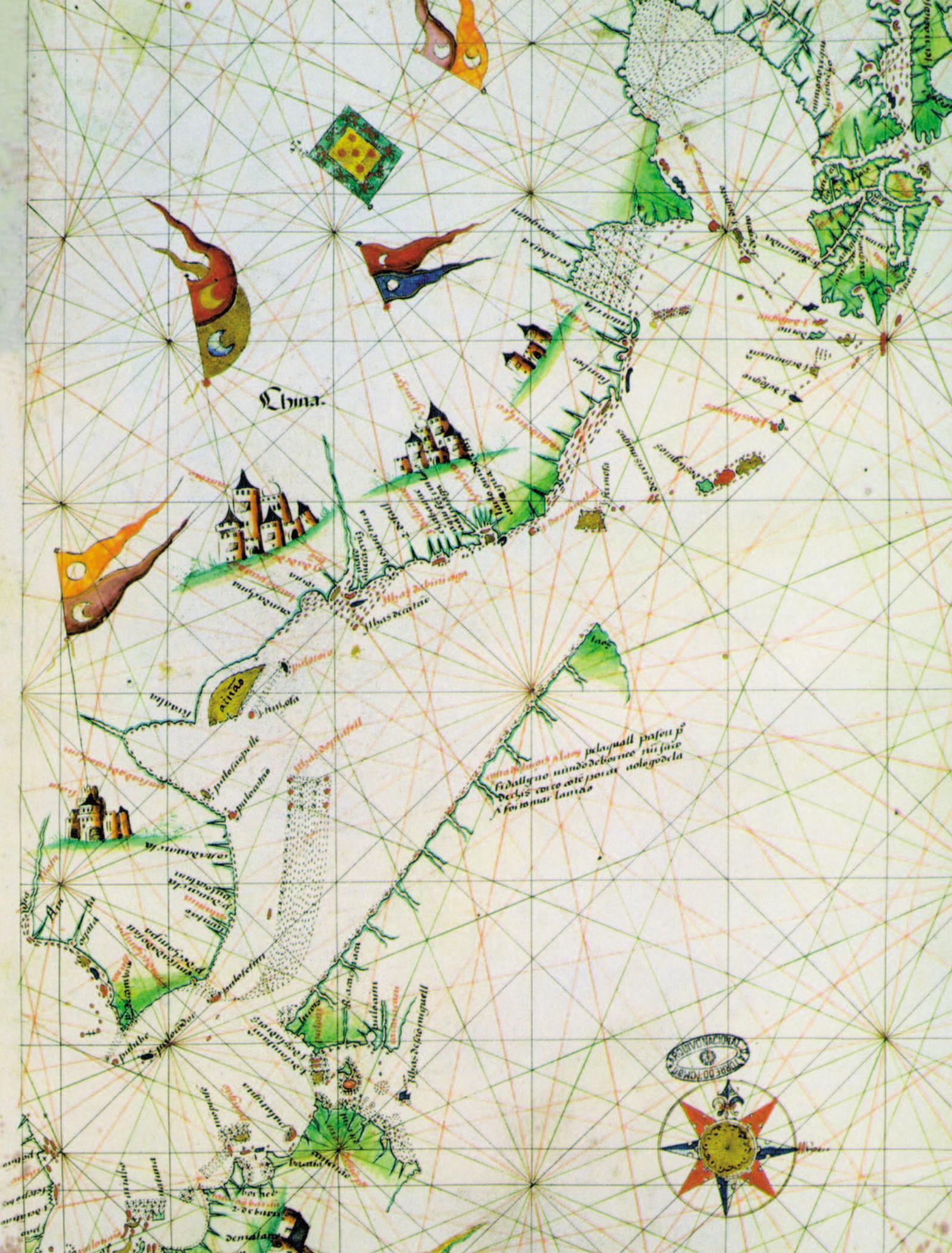
正如人們看到的那樣，迪奧戈·多·科托在其著作中製造的問題要比他解決的問題還要多。首先，他說賈梅士可能被弗蘭西斯科·巴雷托總督委任為死者事務總監；其次，他說在履行其職務過程中曾訪問過中國沿海的一些口岸；緊接着他還說，在回程中詩人在暹羅灣海岸遭遇了海難，好在從悲劇中逃生，並挽救了他的《葡國魂》手稿；最後，迪奧戈·多·科托甚至在賈梅士的傳奇經歷中增添了全新的東西，說詩人在這次海難中可能痛失了一位與他同行的十分漂亮的“中國姑娘”，在災難過後，詩人可能還寫了兩首十四行詩獻給這位謎一般的中國姑娘。

迪奧戈·科托的《80年代》手稿1917年在里斯本科學院<sup>(47)</sup>的一期院刊中一發表，立刻引起了研究賈梅士學者們的注意，因為書中上述內容涉及賈梅士傳奇經歷中的一些研究者們當時完全不知道的東西。最近，科托的這一著作擴充本手稿的又一復印件在馬德里出現。然而，分析過該著作手稿的學者們並不都同意這一改編本是迪奧戈·多·科托本人所作。特別是那些從事葡萄牙人在東亞之歷史研究的學者，他們之中一些人根本不承認其擴充本手稿的可靠性<sup>(48)</sup>，另一些人則認為擴充本是晚些時候別人根據葡萄牙這位編年史家著作的原稿改編的，但同時塞進了許多自己的東西。甚至有人暗示，迪奧戈·多·科托著作中的上述內容可能是甚麼人晚些

時候添加進去的，因而不能將其強加給原作者，因為這位歷史學家是一貫堅決反對他人將自己的評論塞進其作品中的。<sup>(4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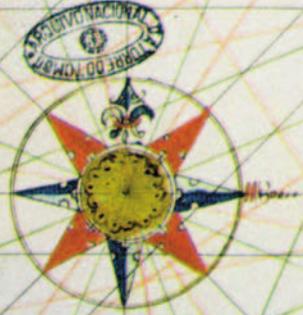
後來，《80年代》擴充本出版社通過認真研究和考證確鑿無疑地證明了該版本的可靠性，迪奧戈·多·科托的確是這一擴充本手稿的作者，有關賈梅士遭遇海難的情節確實是出於他的手筆。<sup>(50)</sup>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令我們懷疑迪奧戈所敘述的東西，至於評註中敘述的那段情節與原作不相一致的內容或許是偶然的，可能因為迪奧戈的《80年代》擴充本這一手稿是在他所描述的事件發生五十多年之後，即1614或1615年才完成的，這樣就難免有記錯弄混之可能。<sup>(51)</sup>但是，這裡有一點細節尚有必要強調指出，迪奧戈在充實他的原作和改寫其上述擴充本之前，有可能已經參閱過1584年出版的《葡國魂》評註本，在該版本中讀者恰恰可以讀到有關賈梅士在赴中國的旅途中遭遇海難以及在遠東某個地方書寫上述關於“流淌的江河”之十四行詩的敘述，為了令自己的推斷更進一步，他甚至可能參閱了於1613年出版的由馬努埃爾·科雷拉 (Manuel Correia) 評註的新版《葡國魂》，在該版本中說賈梅士去過中國，並擔任過死者事務總監。看來，這位葡萄牙編年史家可能就是這樣，在根據自己對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1569年事件的回憶的基礎上，並利用從不斷出版的上述評註本中獲得的新信息改寫成他的《80年代》擴充本中的那個段落。

在賈梅士傳奇經歷中有關涉及中國問題方面，迪奧戈·多·科托在其擴充本中真正增加的唯一的新東西就是關於迪娜梅妮的描述，不過這位歷史學家在作品中將其寫成了 Dinamente (迪娜夢特)。根據他的描述，詩人賈梅士在從中國返回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迪娜夢特”的“非常漂亮的中國姑娘”陪伴，不幸的是她可能在詩人遭遇的那場海難中去世了。雖然僅僅有迪奧戈·多·科托的被認為是權威的文獻資料<sup>(52)</sup>能證實這一情節的可信性，但我們覺得它並沒有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祇要我們承認那位中國姑娘的社會地位，正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實際上是很低下的。<sup>(53)</sup>



China.

Sumatrae insulae pelagum pascu p  
fidalgio mundo debarneo nu suo  
dehis ex co ate pascu uolepoda  
A fou tmar lania



## 迪娜梅妮們

1555年前後，葡萄牙人已頻繁活躍在中國沿海一帶。正是在這一年，葡萄牙文獻資料中首次提及澳門。<sup>(54)</sup>葡萄牙人每天都在這些地區同這個帝國南部的中國人打交道。但是，如果說他們同包括活躍在中國沿海的海盜到監察海上貿易的廣東及福建兩省行政高官在內的各社會階層的中國人們的關係有大量的文獻作證的話，那麼他們同當時處在社會最底層的中國女性的關係則難以找到或者說根本找不到文獻資料的正式記載，因為當時盛行於中國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觀是儒家學派的。在這種道德觀的桎梏下，特別是社會地位高的中國婦女，都過着一種禁錮幽居的生活，尤其被禁止同外國人有任何接觸。<sup>(55)</sup>生活在葡萄牙人經常出入的廣州或其它口岸的有錢人家的中國女性，出行時通常是坐在關閉嚴實的轎子裡，由傭人或幫工們抬着走。多明我會傳教士加斯帕爾·達·克魯茲修士（Frei Gaspar da Cruz）1556年訪問廣州看到中國人生活中的這一情景時，真是感到萬分驚訝。對此，他後來在其作品《關於中國事情的報道》中這樣寫道：“她們過着十分深居簡出的生活，以至於在廣州整座城市裡，除了那些社會地位低下的女人和客棧老板娘之外，常常見不着一個女人在街上走動。當她們出門時，你也看不見，因為她們是坐在封得嚴嚴實實的轎子裡的。”<sup>(56)</sup>

另一方面，在當時的中國，那些貧困潦倒的家庭不得不出賣或無期限出租自己兒女的勞動力，以解決其最緊迫的經濟問題。<sup>(57)</sup>葡萄牙人很快就瞭解到這一情況，於是他們就好像在亞洲其它地區那樣，隨即採取了入鄉隨俗的做法，開始購買或僱傭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男女勞動力幹活。根據可靠的文獻記載，在那些年代航行在中國海域的許多葡萄牙船隻上都有中國男女傭人，他們幫助主人做形形色色的雜活。1552年弗蘭西斯科·沙勿略在上川島上逝世前，他的病床邊就始終有一個被叫做安東尼奧的中國僕人在那裡侍候他。<sup>(58)</sup>

須順便指出的是，這一非正式的僕役交易導致了當時在中國的某些地區特別是南方地區傳播着葡萄牙人購買男女孩童宰來煮食的流言蜚語。若昂·巴羅斯（João de Barros）在其作品《30年代》中確認了當時流傳在廣州的這一流言：“那裡傳說我們經常購買暗中販賣的男女孩童甚至是忠厚老實人家的子女殺來烤熟吃。”緊接着，這位17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便站在一個典型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抨擊中國人的這一態度，在分析其中原因時他認為是相互間缺乏接觸瞭解的緣故：“他們相信真有那樣的事情，感到我們很恐怖，因為他們以前對我們一無所知。當然不是說整個東方人都是這樣看我們的，別的地區的人根本不相信我們會幹這樣的事情。不過，對於許多中國人有那樣的認識，我們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對我們知之甚少。”<sup>(59)</sup>

由此看來，迪奧戈·多·科托傳遞的關於那個中國姑娘陪伴賈梅士的信息沒有甚麼不可信的。就像如此多的同代人那樣，詩人賈梅士或許每到亞洲的一個地區就自覺地去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因此，迄今為止，多數學者接受迪娜梅妮是一個已被證實的事實，而且認為這個名字富有詩意，出自古典文學作品。<sup>(60)</sup>還有一位學者認為，“Dinamene”（迪娜梅妮）這個名字可能是0賈梅士從一個叫做“Ti-Nam-Men”中文名字音譯過來的<sup>(61)</sup>，不存在任何虛構，因為這個名字在中文中確實存在。<sup>(62)</sup>其實，這一看法沒有甚麼根據。如果說“Dinamene”這個名字在中文裡真的存在，那它可能就是生活在廣東省沿海漁船上的無數漁家姑娘中的一個，這些姑娘幾乎終生在海上捕魚，並就地進行交易。<sup>(63)</sup>

最近一段時期，有些學者或許在一種有點不合時代潮流的清教主義的驅動下，對那種認為偉大詩人賈梅士同一些社會地位低下的亞洲姑娘有某種形式的關係的觀點表示憤怒。在這些人看來，一個詩人似乎就祇能整天埋頭書寫優秀的詩篇。<sup>(64)</sup>然而，那時在海外掙搏的葡萄牙人的精神生活和性生活至今仍鮮為人知，還沒有引起研究者們的任何重視，這顯然是個不爭的事實。16世紀幾乎沒有一個歐洲

◁（遠東地圖）（約1560年，作者佚名，選自若昂·德·利斯博阿《航海日誌》）

女人來到亞洲，這一事實無疑可以解釋當時在亞洲的葡萄牙男人們為甚麼極易同亞洲女性發生親密的關係。如果說當時確實並不是所有的葡萄牙男人都像尼古勞·蘭西洛托(Nicolau Lancilotto)神甫1555年在馬六甲看到的那個葡萄牙男人所做的那種醜事的話(他“勾引了二十四個不同膚色的女人，而且所有這些女人都被他為所欲為”(65))，那麼以下這一情況也幾乎可以說是千真萬確的，當時遠離故鄉的葡萄牙軍人和商人同亞洲女人有感情糾葛的事非常頻繁。(66)因此，從當時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整個歷史背景的角度來看，賈梅士有一個中國姑娘陪伴旅行完全是平常的事，完全可能是真實可靠的。至於說有如此多的人花如此多的筆墨來探討關於姑娘激發了他書寫抒情詩靈感的问题，則是一個更為敏感的問題，實已超出了本文研究的範圍。(67)

### 結 論

在賈梅士傳記中所有涉及中國的問題，祇有一點看來是確實的。根據當時在印度國施行的海外法制，賈梅士不可能擔任過所謂的“死者事務總監”一職。這個職務，正如我們在上面提到過的，首先是《葡國魂》1613年版的評論家馬努埃爾·科雷拉強加給詩人的。事實上這一職務當時祇是在印度國的首都才設有，通常由法學學士擔任，這種學位看來賈梅士並沒有，儘管他有令人欽佩的豐富學識。(68)即使在例外情況下，對於一個像賈梅士這樣的普通軍人來說，那個職位也過於重要了。

至於有關他在一次去中國的旅途中擔任過死者事務專員的推測，同樣缺乏證據。現存資料表明，那時在中國沿海並不存在一個很穩定的葡萄牙人定居點，因為儘管從1520年起，葡萄牙國王就非常支持去中國的拓殖航行，但並沒有因此立即在那個天朝的領地上建立一個支持葡萄牙人事業的基地。(69)至於死者事務專員一職，不言而喻那時都是由赴“日本之行”的船隊長兼任的。正如1563年下發給負責中國及日本之行的若昂·門多薩(João Mendonça)船長的准照所證實的那樣：“若昂·門多薩本人在



葡萄牙民族偉大詩人賈梅士《葡國魂》封面(1613)

往返途中，在中國澳門等口岸及日本口岸停靠時還將兼任死者事務專員之職。”(70)關於這一點，事過若干年之後，即在1582年寫成而未署名的《城市與城堡記事》恰恰予以確認，其書這樣寫道：“船長們都同時兼任死者事務專員職務，負責處理在往返旅途中以及在馬交等口岸停留時死去的人的各項事務……”(71)但書中並未記載賈梅士在赴遠東之旅的途中曾擔任過船長之職務。在那段時期負責日本之旅的船隊長名錄，現在已眾所周知(72)，但詩人賈梅士的名字並沒有被列於其中。

萊昂內爾·德·索薩的一封信中有一段寫道，在一次赴中國之行中，“我還被委任擔任死者事務專員職務，而該職務過去總是別的人擔任”(73)。不過，這一記載一直引起爭議，因為過去有許多學者堅持認為，正是在這次航行中，賈梅士被委任擔任死者事務專員這一職務。(74)然而，這一說法完全沒有文獻

佐證，因為這位阿爾加維船長上述信件之落款日期為1556年1月15日，主要談及的是1554年進行的一次中國之行，而按照有的學者的研究，那個時候賈梅士已在遠東的那些定居點默了一些年頭。<sup>(75)</sup>正如賈梅士的傳記家們所希望的那樣，賈梅士的確可能在1556-1560年間訪問過東亞的一些地區，譬如馬六甲、暹羅和馬魯古群島，但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可以確認這一假定的旅行文獻資料。有關這個問題的所有論據，其實都基於傳記作家們根據詩人賈梅士本人的作品或者根據後人對這些作品的評註進行的推斷。在那些年代寫於東方的幾十封有關發生於中國海域之事件的信件中，沒有一封提及賈梅士這個名字。

有一位研究者甚至認為，賈梅士既不真正瞭解中國，也沒有訪問過這個國家。<sup>(76)</sup>我覺得他的看法不無道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在《葡國魂》中提到中國的地方，並不像提及亞洲其它地區那樣，比較詳細具體，相反地對於如果在那裡居住過的人來說，卻顯得過於空洞，而且很不準確，甚至出現錯誤。比如，他在其作品的一個地方提到中國皇帝時，竟然錯誤地將其設想為選舉出來的。請看，在下面這段詩句中，詩人是如何來講述這件事情的：

它的國王並非天生的親王，  
更不是父位子襲世代傳遞，  
他們推舉一位仁義的君子，  
以勇敢智慧德高望重著名。<sup>(77)</sup>

這對於一個如果說是曾經訪問過中國的人來說，或者對於一個如果說訪問過某個地方（譬如馬六甲），並在那裡聽說過中國這個帝國的一些事情的人來說，絕對是個不可原諒的訛誤。約在1572年，當他的作品《葡國魂》第一版問世時，葡萄牙人已經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就頻繁地出現在中國沿海一帶了，就已經有許多機會收集關於中國的包括中國的政體以及皇帝繼承法等各方面情況的詳細訊息了，事實上，這些訊息當時在葡萄牙的海外領地已經廣為流傳。<sup>(78)</sup>

即使賈梅士沒有到過中國，但如果稍微查閱一下譬如像若昂·德·巴羅斯的《30年代》（該書於1563年在里斯本出版，其中幾章提及中國）<sup>(79)</sup>，或者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編撰的《葡萄牙人發現及征服印度史》的第四卷，該書於1553年在科英布拉印刷出版，其中同樣有幾章提及中國<sup>(80)</sup>，就會得到有關中國實際情況方方面面的資料，特別是中國政權運作方式的資料，更不用說如果查閱一下於1570年在埃武拉出版的《關於中國事情的報道》了，詩人賈梅士同樣是有可能得到那一著作的，因為該書是那時歐洲出版的有關中國問題最全面最詳盡的名著，其作者加斯帕爾在書中談到中國皇帝時這樣寫道：“他的任何一位妻子為他生的第一個兒子將繼承其皇位。”<sup>(81)</sup>

學者們引用過的15-16世紀的有關中國情況的文獻資料都說詩人賈梅士到過中國，但從未說他到過馬交。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Manuel Severim de Faria）是第一個將賈梅士與大約於1555年在中國沿海建立的這個葡萄牙人定居點聯繫起來的人。在他撰寫的詩人賈梅士的傳記中說賈梅士“在澳門期間曾擔任死者事務總監”<sup>(82)</sup>。在16世紀後半葉以及17世紀前幾十年澳門之所以獲得如此之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為法里亞·依·索薩出的差錯造成的。在他那個時代，任何提及葡萄牙人在中國南部沿海的活動，勢必立即與馬交聯繫起來，因為澳門是當時葡萄牙人在那一帶海域唯一的貨物集散地。這樣一來便導致近代歷史學家們將16-17世紀時提及中國情況的文獻資料都當成是提及澳門的文獻資料，並使他們將其爭論集中在賈梅士是否到過馬交這個“上帝聖名之城”這一點上。<sup>(83)</sup>在這種情況下，賈梅士來過遠東這個城市的可能性便不得不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們認為，此一問題應該重新加以認真的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1558-1559年間，馬交是一個僅有一些臨時搭建起來的木房和茅屋的微不足道的小村落，一些在中國沿海一帶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季節性地聚集在那裡。葡萄牙人被准許在阿媽溜（Amacau）海灣



賈梅士巖洞 手工上色版畫·作者佚名

定居祇是之前幾年的事，首次書面提到在那裡定居一事是在1555年，這可從現存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以及耶穌會士梅爾希奧·努內斯·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甫當時書寫的一些信件中得到證實。<sup>(84)</sup>也是在那段時間裡，來到中國沿海的葡萄牙船隻不停地探尋其它通商口岸，比如，漳州和浪白溜(Lampacau)，前者在1555年被放棄，後者直到1560年都還居住着葡萄牙人。因此，馬交約在1555-1557年間就已經存在了，當時它還不是一個繁華的城市（這祇是以後才逐步地發展起來的），祇是一個邊境貨物集散地，頻繁活躍於中國海域並同中國人進行海上交易的葡萄牙商人定期地回到那裡駐足。

在中國沿海確實存在這一規模不大的貨物集散地與賈梅士可能在遠東的這個地方默過明顯地不應

該混為一談。如果說《葡國魂》的作者確實在1559年前後遊歷過中國沿海地區，那麼他或許照樣同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不幾年之前所做的那樣，在浪白溜或馬交上岸，因為這是那時葡萄牙人頻繁出入的兩個口岸。硬將賈梅士同澳門聯繫起來是某些澳門歷史編纂學者之所為，這表明這些史學工作者明顯染上了不從客觀實際出發祇憑主觀臆測看問題的毛病。由於缺乏可靠的文獻資料，此問題便成為大家超越歷史研究最基本原則的界限隨意進行爭論的一個焦點。因此，譬如說，一個著名的歷史學家在沒有任何文獻資料佐證的情況下可以寫道：“賈梅士在馬交居住了一段時間”<sup>(85)</sup>，另一個史學家也表示根據“傳統”觀點，他讀成賈梅士到過馬交這個“上帝聖名之城”的說法<sup>(86)</sup>，與此相反，卻還有一些被認為更加嚴肅和精心的歷史學家同樣在沒有拿出

任何文獻資料證據的情況下則斷言，賈梅士根本不瞭解馬交，或者說他就根本未到過馬交。<sup>(87)</sup>

的確，從客觀分析現今已知的文獻資料證據（包括賈梅士的詩，16-17世紀的評論家們對賈梅士作品的評註，以及迪奧戈·多·科托的《80年代》的擴充本中的章節）出發，看來確實難以得出賈梅士是否到過馬交的結論。不過，他們對當時被稱作“天朝”的中國的各種評論的支離破碎和膚淺可能意味着是對這個問題的否定回答，儘管同樣由於缺乏文獻資料尚不能對這個判斷作出明確的結論。至於有關賈梅士遭遇海難的問題，如果真有其事的話，那很有可能是發生在暹羅灣附近海域，正如《葡國魂》第10章第128節中所講述的那樣。如果這一情況確實是真的，那麼這本身就合情合理地表明，賈梅士及其遭難的同伴在逃生後最大可能是在湄公河海口靠岸了。我們之所以這樣推測，是因為譬如說，假若海難是發生在帕爾塞爾群島，那麼脫險者們最容易抵達馬交或當時葡萄牙人頻繁出入的另一個中國沿海口岸。對於這個假設，我們祇要再來看巴爾塔扎爾·加戈（Baltazar Gago）神甫在1562年講述的發生在之前兩年的一次海難情形就更好理解了。他說，當時有一艘從日本返航的葡萄牙商船在中國的海域遭遇海難後，倖存者們祇好到就近的海南島靠岸，接着在那裡從陸路發到馬交一封求救信，而他們最終抵達葡萄牙人那個定居點則是在那次災難發生六個月之後。<sup>(88)</sup>如果賈梅士真的是在湄公河三角洲附近遭遇的海難，那麼按照常理推斷他極有可能沒有再繼續來中國的旅程，因為那個時候他還在離中國沿海相當遠的航道上，那時他最有可能乘某個商船往位於暹羅灣或附近海域的某個港口（譬如阿育提亞（Ayutia）或帕坦（Patane）等）靠岸，因為那些口岸通常都是葡萄牙人經常出入的地方。

通過上述探討賈梅士傳奇的經歷中涉及中國問題的方方面面，我認為已可以得出下面這些結論：1) 關於所謂賈梅士遭遇海難的事，儘管在當時葡萄牙人在遠東航行的那種條件下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無論其發生的時間還是空間，迄今都沒有文獻資料足以證明之。2) 關於所謂賈梅士的中國之行問題，

儘管早在16世紀中葉就有如此之多的葡萄牙人進行過種種假設，但同樣缺乏文獻資料加以確證之。3) 關於所謂詩人在馬交居住過的問題，儘管這個口岸葡萄牙人至少在1555年就已經抵達了，但迄今仍然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之。4) 關於所謂賈梅士擔任過死者事務專員或死者事務總監職務一事，根據16世紀葡萄牙海外行政管理中施行的委任這類職務的相關法例來看，可能性微乎其微。5) 最後一點就是關於詩人與一個中國姑娘戀愛的事，儘管按照當時葡萄牙人同亞洲人之間建立的社會關係的通常模式來看，完全是情理之中可能發生的事，但時至今日還祇是停留於學者們的討論而已。總而言之，賈梅士“可能”進行過一次中國海域之行，“可能”在暹羅灣遭遇過海難，亦“可能”真有過一位中國女伴，但是，他肯定沒有擔任過所謂“死者事務專員”，沒有在馬交長住過，更沒有在一個所謂馬交石洞寫過他的著名史詩，就連其中的一部分也沒有。雖然如此，但在新的相關的文獻資料被發現之前，所有這些涉及賈梅士生活及作品的中國問題，都將繼續為人們千方百計地，甚至透過採用近乎武斷的方法加以探討和思索，直到打開昔日這道歷史閘門為止。這就是說，我們長久以來所面對的這個充滿着我們如此豐富多彩的面向過去的歷史學家們的謎團，大家仍須繼續面壁求索或莫衷一是。

#### 【註】

- (1) 賈梅士傳記中有關中國問題的敘述請參見若阿金·費雷拉的著作《賈梅士：疑問與答疑》。作者在其中儘管提出了不少有趣的見解，但由於他採用的是散文文體，所提及的文獻及參考書目均未指明出處，所以其所提供探索研究的學術價值則大打折扣。
- (2) 參閱博爾熱斯·菲格雷多（A. C. Borges de Figueiredo）的著作：《《葡國魂》中的地理》，以及奧爾蘭多·里貝羅（Orlando Ribeiro）新近出版的作品《賈梅士與地理》。
- (3) 參閱若熱·博爾熱斯·馬塞多（Jorge Borges de Macedo）的著作：《《葡國魂》與歷史》，頁77-100，以及羅傑·比斯馬特（Roger Bismut）的著作：《《葡國魂》中的虛構與事實》，頁87-107。
- (4) 賈梅士：《葡國魂》，Hernâni Cidade 編輯出版，第十章，第129節。
- (5) 賈梅士：《葡國魂》，Hernâni Cidade 編輯出版，第2章第54節，第七章第41節，第10章第131節。有關16世紀

- 葡萄牙人同中國人的交往情況，請參見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的著作：《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
- (6) 米沙埃爾·皮爾松（Michael N. Pearson）：《西印度海岸》，頁41-66。
- (7) 請參閱瑪麗亞·安托涅塔·蘇亞雷斯·德·阿澤維多（Maria Antonieta Soares de Azevedo）新近出版的關於賈梅士傳記問題的著作《當賈梅士談論自己時》，頁291-314，以及魯西亞娜·斯特加諾·皮克西奧（Luciana Stegagno Picchio）的著作《被浸濕的詩篇》，頁243-265。
- (8) 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Joaquim Veríssimo Serrão），《葡萄牙歷史》，卷三，頁389。
- (9) 賈梅士：《葡國魂》，Hernâni Cidade 編劇出版，第10章，第128節。
- (10) 賈梅士：《葡國魂》，1584年出版，第7章第80節，亦請參閱阿·利·弗蘭西斯·阿金斯（A. Lee-Francis Askins）的作品《克里斯托旺·博爾熱斯抒情詩集》，頁216。
- (11) 關於馬努埃爾·科雷亞的情況，請參閱若阿金·費雷拉的著作：《疑問與答疑》，頁13-18。
- (12) “卡目巴亞”（Cambaia）即現今的柬埔寨（Camboja）。在16-17世紀的原始資料中，這兩個名稱在書寫上經常混用。
- (13) 賈梅士：《葡國魂》，Manuel Correia 編輯出版，第10章第128節。
- (14) 參閱《葡萄牙歷史辭典》，卷一，頁303。
- (15) 賈梅士：《葡國魂》，Manuel Correia 編輯出版（頁5）。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葡萄牙歷史》，卷一，頁326-330。
- (16) 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葡萄牙歷史》，卷一，頁326-330。
- (17) 請參閱馬丁·德·阿爾布開克（Martim de Albuquerque）的著作《權力的體現》，頁25-88。該書對此問題有非常扼要的講述，並附有大量參考書資料。
- (18) 加西亞·德·奧爾塔，《印度藥用植物及藥物對話》，卷一，頁7-9。
- (19) 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Manuel Severim de Faria），《政治演講集》，頁114。至於這位作者的情況，請參閱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所著的《葡萄牙歷史》，卷二，頁80-96。
- (20) 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第21章。
- (21) 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政治演講集》，頁115。
- (22) 有關這一問題請參閱（1582）出版的《城市及城堡記事》。
- (23) 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政治演講集》，頁116。
- (24) 這裡，塞維林·德·法里亞將賈梅士比作塞薩爾，後者曾從水中拯救出他的《評論集》手稿（請參見塞維林的《政治演講集》，頁116）。
- (25) 關於馬努埃爾·德·法里亞·依·索沙的情況，請參閱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葡萄牙歷史》，卷二，頁106-116。
- (26) 賈梅士：《葡國魂》，馬努埃爾·法里亞·依·索沙編輯出版，第10章第128節。
- (27) 魯西亞娜·斯特加諾·皮克西奧，《被浸濕的詩篇》，頁255。
- (28) 魯西亞娜·斯特加諾·皮克西奧出於不同的研究計劃的需要，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了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態度，正如她在其著作的末尾所說：“在這一時刻，人們對16世紀的一個名叫賈梅士的人是否確實在一條叫做湄公河的河口遭遇海難，怎樣遭遇海難以及在何時遭遇這一海難等一系列問題的興趣或許更小了。”（《被浸濕的詩篇》，頁265）
- (29) 《聖·弗蘭西斯科·沙勿略書信集》，卷二，頁12。
- (30) 若爾當·德·弗雷塔斯，《賈梅士遭遇的海難》，頁10（這是本人根據現存於 ANTT, CC (1-104-60) 的萊昂內爾·德·弗雷塔斯的信件原始手稿對若爾當·德·弗雷塔斯的著作加以修改而來的）。
- (31) 關於萊昂內爾·德·弗雷塔斯的亞洲航線，請參見洛瑞羅的著作《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
- (32) 請參閱《航海日誌》，頁120。
- (33) 若爾當·德·弗雷塔斯，《賈梅士遭遇的海難》，頁29。
- (34) 賈梅士：《葡國魂》，Hernâni Cidade 編輯出版，第十章第128節。
- (35) 若爾當·德·弗雷塔斯，《賈梅士遭遇的海難》，頁31。
- (36) 魯西亞娜·斯特加諾·皮克西奧，《被浸濕的詩篇》，頁259。
- (37) 請參閱萊德加里奧·德·阿澤維多·菲略（Leodegário de Azevedo Filho）的著作《賈梅士抒情詩入門》，頁23-42，亦請參閱若澤·埃爾馬諾·薩拉依瓦（José Hermano Saraiva）的著作《賈梅士鮮為人知的生活》，頁338。
- (38) 瓦斯科·格拉薩·莫拉（Vasco Graça Moura），《賈梅士：天賜的才幹》，頁89。
- (39) 阿·利·弗蘭西斯·阿金斯（A. Lee-Francis Askins），《克里斯托旺·博爾熱斯抒情詩集》，頁207。
- (40) 瓦斯科·格拉薩·莫拉，《賈梅士：天賜的才幹》，頁80-81。
- (41) 路易斯·達·庫尼亞·貢薩爾維斯（Luís da Cunha Gonçalves）：《賈梅士沒有到過澳門》。
- (42) (43) 請參閱《航海日誌》，頁200；頁107-118。
- (44) 請參閱《東波塔檔案館文獻資料集》，卷八，頁532。
- (45) 關於巴羅斯的情況，請參見查爾斯·博克塞爾的著作《若昂·德·巴羅斯》，關於科托的情況，請參見洛瑞羅的作品《迪奧戈·多·科托的圖書館》。
- (46) 馬麗亞·奧古斯塔·利馬·克魯茲（Maria Augusta Lima Cruz），《迪奧戈·多·科托與亞洲80年代》，卷一，頁469-470。
- (47) 若昂·格拉維（João Grave），《關於16世紀的文學史》，頁1041-1048。
- (48) 文德泉：《賈梅士到過澳門》，頁21-22。
- (49) 查爾斯·博克塞爾：《賈梅士甚至曾到過澳門？》，頁39。
- (50) 馬麗亞·奧古斯塔·利馬·克魯茲，《迪奧戈·多·科托與亞洲80年代》，卷一，頁xi-iv。
- (51) 瓦斯科·格拉薩·莫拉，《賈梅士：天賜的才幹》，頁71。
- (52) 關於科托著作的文獻價值，請參閱洛瑞羅的著作，《迪奧戈·多·科托的圖書館》。
- (53) 格拉謝特·巴塔利亞：《激發書寫抒情詩靈感的姑娘們》，頁87。
- (54) 洛瑞羅：《探尋澳門的源頭》。

- (55) 羅伯特·旺·古利克 (Robert van Gulik), 《古代中國人的性生活》, 頁 330。
- (56) 加斯帕爾·達·克魯茲:《關於中國事情的報道》, 第十五章, 頁 173-174。
- (57) 塞謬爾·科林 (Samuel Couling), 《中國百科》(*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頁 518-519。
- (58) 洛瑞羅, 《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 第 19 章。
- (59) 若昂·巴羅斯:《30年代》, 卷六, 第一章, 關於該問題, 亦請參見霍啟昌 (Fok Kai Cheong) 的著作《關於葡萄牙人定居情況的研究》(*Estudos sobre a Instalação dos Portugueses*), 頁 11-27。
- (60) 參見: "Ansi le roman de Dynamène retrouve-t-il toute sa réalité, même si ce nom, qui figure dans la VIIe Éloge, et que le poète a pu trouver dans l'Iliade, est un nom de convention" (羅傑·比斯姆特:《為迪娜梅內辯護》, 頁 93)。
- (61) 阿弗拉尼奧·佩肖托 (Afrânio Peixoto):《賈梅士》, 頁 367。
- (62) 格拉謝特·巴塔利亞:《激發書寫抒情詩靈感的姑娘們》, 頁 89。
- (63) 若澤·馬麗亞·布拉加 (José Maria Braga):《賈梅士生活及作品記事》, 頁 28。
- (64) 文德泉:《賈梅士到過澳門》, 頁 27-28。
- (65)《印度文獻資料集》, 卷二, 頁 131。
- (66) 查爾斯·博克塞斯:《帝國內的種族關係》, 頁 45-84。
- (67) 相關問題, 作為例子, 請參閱《文化與文學教程》, 卷一, 頁 247-248。
- (68) 席爾瓦·迪亞 (J. S. Silva Dias):《賈梅士在 16 世紀的葡萄牙中的情況》。
- (69) 請參閱《印度之家記事》, 第 10、46、51、97、101、107 和 115 期。
- (70) 查爾斯·博克塞斯:《阿馬卡烏大船》, 頁 151。
- (71)《城市與城堡記事》, 頁 198。
- (72) 喬治·舒漢姆 (Georg Schurhammer):《弗蘭西斯科·沙維爾》, 卷四, 頁 845-854。
- (73)《東波塔檔案館文獻資料集》, 卷一, 頁 914。
- (74) 若阿金·費雷拉:《賈梅士:疑問與答疑》, 頁 5-159。
- (75) 洛瑞羅:《探尋澳門的源頭》。
- (76) 路易斯·達·庫尼亞·貢薩爾維斯 (Luís da Cunha Gonçalves):《賈梅士沒有到過澳門》, 頁 166-167。
- (77) 賈梅士:《葡國魂》, Hernâni Cidade 編輯出版, 第十章第 130 節。
- (78) 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員》, 第 19 章和第 23 章。
- (79) 若昂·德·巴羅斯, 《三十年代》, 卷二, 第 6 至 8 章; 卷六, 第 1、2 章。
- (80)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達:《葡萄牙人發現及征服印度史》, 卷四, 第 27 至 31 章。
- (81) 加斯帕爾·達·克魯茲:《關於中國事情的報道》, 第 22 章, 頁 216。
- (82) 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政治演說集》, 頁 115-116。
- (83) 關於此問題請着重參閱文德泉的作品《賈梅士到過澳門》以及若爾當·德·弗雷塔斯的著作《賈梅士在澳門》。
- (84) 請參閱魯易·馬努埃爾·洛雷羅的著作《探尋澳門的源頭》中引用的文獻資料。
- (85) 若爾當·德·弗雷塔斯:《賈梅士在澳門》, 頁 7。
- (86) 文德泉:《賈梅士到過澳門》, 頁 27。
- (87) 路易斯·達·庫尼亞·貢薩爾維斯:《賈梅士未到過澳門》, 頁 66-167。關於這個問題, 查爾斯·博克塞斯特別指出:“沒有任何一本現代書籍, 任何一個文獻或現存的資料直接或間接提及賈梅士到過澳門。”(《賈梅士甚至到過澳門?》, 頁 34)
- (88) 安東尼奧·佛朗哥 (António Franco), 《德行形象》, 卷一, 頁 678-683。

## 【參考書目】

- 馬丁·德·阿爾后布克爾克 (Albuquerque, Martim de):《權力在賈梅士身上的體現》, 里斯本, 國家印刷廠—鑄幣廠, 1988 年。
- 《東波塔檔案文獻資料集》, António da Silva Rego 編輯出版, 12 卷, 里斯本, 海外歷史研究中心, 1960-1977 年。
- 利·弗蘭西斯·阿金斯 (Askins, A. Lee-Francis):《克里斯托旺·博爾熱斯抒情詩集》[1578], 布拉加, Barbosa & Xavier 出版社, 1979 年。
- 萊奧德加里奧·德·阿澤維多·菲略 (Azevedo Filho, Leodegário de):《賈梅士抒情詩入門》, 里斯本, 葡萄牙語言文化學會, 1991 年。
- 馬麗亞·安東涅塔·蘇亞雷斯·阿澤維多 (Azevedo, Maria Antonieta Soares de):《當賈梅士談論自己時》, 《群島雜誌》(德爾加達島), 卷三, 1981 年, 頁 291-314。
- 若昂·德·巴羅斯 (Barros, João de):《亞洲:三十年》[1563]; 復印本, Isabel Vilares Cepeda 統籌出版, 里斯本, 國家印刷廠—鑄幣廠, 1992 年。
- 格拉謝特·巴塔尼亞 (Batalha, Graciete):《從近代評論看激發賈梅士書寫抒情詩靈感的姑娘們》, 《馬賽克》, 澳門, 卷八, 第 47-49 期, 1954 年, 頁 77-95。
- 羅傑·比斯姆特 (Bismut, Roger):《為迪娜梅妮辯護》, 《葡萄牙研究簡報》(里斯本—巴黎), N.S., 卷三十, 1969 年, 頁 89-93。
- 《葡國魂》中的虛構與實事》, 《走向復活的賈梅士》, 作者, H. Plard, 布魯塞爾—巴黎, Belgique 大學出版社, 法國大學出版社及古本江 (Caluste Gulbenkian) 基金會, 1982 年。
- 查爾斯·博克塞爾 (Boxer, Charles R.):《1415-1825 年葡萄牙殖民帝國的種族關係》, 波爾圖, Afrontamento 出版社, 1977 年。
- 《賈梅士甚至到過澳門?》, 《賈梅士學會會刊》(澳門), 卷十四, 第 1-4 期, 1980 年, 頁 33-40。
- 《阿媽溜大船》, 澳門, 澳門東方基金會及澳門海事研究中心, 1989 年。
- 若昂·德·巴羅斯:《葡萄牙人文主義者及亞洲歷史學

- 家》，里斯本，葡萄牙東南亞研究中心，2003年。
- 若澤·馬麗亞·布拉加（Braga, José Maria）：《賈梅士生活及作品記事》，堪培拉，葡萄牙大使館，1972年。
- 賈梅士：《葡國魂》[1572]，Hernâni Cidade 編輯出版，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鑄幣廠，1972年。
- 《葡國魂》，里斯本，Manuel de Lira 出版，1584年。
- 《葡國魂》，Manuel Correia 編輯出版，里斯本，Pedro Crasbeeck 出版社，1613年。
- 《葡國魂》[1639]，Manuel de Faria e Sousa 編輯出版，二卷集，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鑄幣廠，1972年。
-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涅達（Castanheda, Fernão Lopes de）：《葡萄牙人發現及征服印度史》，M. Lopes de Almeida 編輯出版，二卷集，波爾圖，Lello & Irmão 出版社，1979年。
- 埃爾納尼·西達德（Cidade, Hernâni），《葡萄牙文化及文學教程》，二卷集，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出版社，1984年。
- 塞謬爾·科林《中國百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3年。
- 加斯帕爾·克魯茲（Cruz, Gaspar），《關於中國事情的報道》[1570]，洛瑞羅編輯出版，里斯本，Cotovia 出版社，1997年。
- 馬麗亞·奧古斯塔·利馬·克魯茲（Cruz, Maria Augusta Lima），《迪奧戈·多·科托與亞洲80年代》，二卷集，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鑄幣廠，1993-1994年。
- 席爾瓦·迪亞斯（Dias, J. S. da Silva），《16世紀葡萄牙的賈梅士》，里斯本，葡萄牙語言文化學會，1981年。
- 《葡萄牙歷史辭典》，Joel Serrão 統籌編輯，四卷集，里斯本，Iniciativas 出版社，1971年。
- 《印度文獻資料集》，十八卷，Josef Wicki 統籌編輯，羅馬，Iesu 社會歷史研究所，1948-1988年。
- 《弗蘭西斯科·沙維爾書信集》，Georg Schurhammer & Josef Wicki 編輯出版，二卷集，羅馬，Iesu 社會歷史研究所，1944-1945年。
- 馬努埃爾·塞維林·德·法里亞（Faria, Manuel Severim de）：《政治演說集》[1624]，Maria Leonor Soares Albergaria Vieira 編輯出版，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鑄幣廠，1999年。
- 若阿金·費雷拉（Ferreira, Joaquim）：《疑問與答疑》，波爾圖，Domingos Barreira 出版社。
- 博熱斯·德·菲格雷多（Figueiredo, A.C. Borges de）：《賈梅士〈葡國魂〉中的地理知識》，里斯本，Adolfo, Modesto & Cia 印刷出版，1883年。
- 霍啟昌（Fok Kai Cheong）：《關於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的研究》，里斯本，Gradiva 出版，1996年。
- 安東尼奧·弗朗哥（Franco, António）：《在耶穌會考驗期的德行形象》二卷集，埃武拉—里斯本，大學印刷廠，1719年。
- 若爾當·弗雷塔斯（Freitas, Jordão）：《賈梅士在澳門》，里斯本，Libânio da Silva 印刷廠，1911年。
- 《賈梅士及其〈葡國魂〉的劫難》，里斯本，Castro Irmão 印刷所，1915年。
- 路易斯·達·庫尼亞·貢薩爾維斯（Gonçalves, Luís da Cunha）：〈賈梅士沒有到過澳門〉，《研究會會刊》（科英布拉），系列四，卷七十五，頁14-42、161-177和318-342。
- 若昂·格拉維（Grave, João）：〈走進16世紀的文學史——賈梅士的一首尚未發表的十四行詩〉，《里斯本科學院二類學報》，卷二，1918年，頁1041-1048。
- 羅伯特·旺·古利克（Gulik, Robert van）：《古代中國的性生活》，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87年。
- 加斯帕爾·德·莫雷拉：《航海日誌》，Léon Bourdon & Luís de Albuquerque 編輯出版，里斯本，海外科學研究委員會，1977年。
- 《葡萄牙王國在印度擁有的城市及城堡記事》[1582]，Francisco Paulo Mendes da Luz 編輯出版，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0年。
- 洛瑞羅：《追尋澳門的源頭》，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
- 《迪奧戈·德·科托的圖書館》，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8年。
- 《貴族、傳教士與中國官員—16世紀時期的葡萄牙與中國》，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
- 若熱·博熱斯·德·馬塞多（Macedo, Jorge Borges de）：《〈葡國魂〉與歷史》，里斯本，Verbo 出版社，1979年。
- 瓦斯科·格拉薩·莫拉（Moura, Vasco Graça），《賈梅士：天賜的才幹》，里斯本，1985年。
- 加爾西亞·德·奧爾塔（Orta, Garcia de）：《印度藥用植物與藥物對話》[1563]，Conde de Ficalho 編輯出版，二卷集，里斯本，國家印刷廠—鑄幣廠，1987年。
- 邁克爾·皮爾松（Pearson, Michael N.）：《印度西海岸—關於葡萄牙記事之研究》，新德里，Concept 出版社，1981年。
- 阿弗拉尼奧·佩肖托（Peixoto, Afrânio），《賈梅士及賈梅士散文》，聖保羅，LISA 出版社，1974年。
- 魯西亞納·斯特加諾·皮克西奧（Picchio, Luciana Stegagno）：〈北京浸濕的詩篇，對賈梅士傳記研究的貢獻〉，《葡萄牙文化中心檔案》（巴黎），卷十六，1981年，頁243-265。
- 《印度之家記事》，Luciano Ribeiro 編輯出版，二卷集，里斯本，海外事務總社，1954-1955年。
- 奧爾蘭多·里貝羅（Ribeiro, Orlando），《賈梅士與地理》，里斯本，地理研究中心，1980年。
- 若澤·埃爾馬諾·薩拉依瓦（Saraiva, José Hermano）：《賈梅士鮮為人知的生活》，歐美出版社。
- 喬治·舒哈姆（Shurhammer, Georg）：《弗蘭西斯科·沙維爾的生活及其所處的時代》，四卷集，帕姆普洛納，納瓦拉政府耶穌會及帕姆普洛納大主教府，1992年。
- 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Serrão, Joaquim Veríssimo），《葡萄牙歷史》十二卷，里斯本，Verbo 出版社，1977-1990。
- 《葡萄牙歷史編纂學》，三卷集，里斯本，Verbo 出版社，1972-1974。
- 文德泉：《賈梅士到過澳門》，澳門，教育及文化司，1981。

黃徽現譯